

传教士与人类学家——对比比利时圣母圣心会 传教士康国泰的研究

吴宁

(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180)

摘要 具有来华传教士和人类学家双重身份的康国泰, 在中国甘肃、青海传教时, 对甘南土人的生活进行了人类学观察, 最终成为一名以研究土族社会而闻名的人类学家。本文主要关注作为人类学家的康国泰的人生经历, 并试图从他个人的社会背景、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学方面, 来探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中西方人类学史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传教士; 人类学家; 康国泰

(中图分类号) C9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2) 05-0031-08

每当论及人类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时, 论者大都不会否认传教士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影响。但是具体到个人, 常常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利时圣母圣心会^①传教士康国泰(Louis M J Schram, 1883-1971)^②生平事迹的研究, 从传教士与民族志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人人类学早期发

展历程。文中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康国泰的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1]他自1954年至1961年发表在美国《美国哲学协会会刊》自然科学类的三篇关于《甘藏边境的土人》人类学论文^③以及一些神父和学者为纪念康国泰而作的若干纪念和研究性的文章。

(收稿日期) 2012-01-18

(作者简介) 吴宁(1972-), 女, 新疆乌鲁木齐人,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

^① 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拉丁语: Congregatio Immaculati Cordis Mariae), 简称 C. I. C. M., 俗称“斯格脱神父”(Scheut Fathers), 是起源于比利的一个国际性天主教传教修会。1862年由南怀义(小南怀仁, Theofiel Verbist, 1823年—1898年)神父创立于布鲁塞尔郊外的斯格脱(Scheut)。该会在中国、蒙古、菲律宾以及比属刚果传教。1865年, 南怀义率首批该会的韩默理等4名传教士到达内蒙古长城外侧的西湾子村(现今河北省崇礼县城址), 从遣使会手中接管了蒙古代牧区。此后圣母圣心会陆续开辟了7个教区: 西湾子教区、绥远教区(主教座堂位于二十四顷地, 1924年迁往归化城, 即今呼和浩特)、热河教区、宁夏教区(包括后来陕北的三边地带, 主教座堂位于三盛公, 即今磴口县)、大同教区、集宁教区(主教座堂位于玫瑰营)和赤峰教区。此外, 甘肃和新疆也是由圣母圣心会开辟的教区, 后于20世纪, 将其在甘肃和新疆的教务转交给圣言会负责。到1955年, 圣母圣心会共有神职人员239人(先后来华的共有679位会士), 教徒23.5万; 创办中小学校960所, 孤儿院、育婴堂19所, 养老院11所, 诊疗所24处。该会还创办了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中文系, 培训来华的传教士。1956年, 该会会士转移至台湾, 在台中主持圣神修院及一些教堂。以上参见维基百科圣母圣心会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6%AF%8D%E5%9C%A3%E5%BF%83%E4%BC%9A>

^② 康国泰, 又称许让。许让这个称谓, 见许让神父著, 费孝通、王同惠合译《甘肃土人的婚姻》。费孝通为此书撰写的序中, 转引了房建昌《土族地区的白虎祭》中对许让的介绍, 房建昌对许让的描述又是转引半之一的《青海民族史入门》P.181中称天主教神父许让(Le. P. L. Schram)所著《甘肃土人的婚姻》(1932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出版), 许让的译名首次出现在这里, 后来学者多以此出为引据。据房建昌考证, 应该是将其翻译成康国泰为对。根据圣母圣心会中文档案以及港台地区教会史家的研究, Le. P. L. Schram在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会史中通常被称为康国泰。本文推测, 康国泰可能是对其佛来芒语名字 Pater Lodewijk, Jozef, Maria Schram的发音汉译。

^③ 康国泰的文章名为 THE MONGUORS OF THE KANSU-TIBETAN FRONTIER(《甘肃边境的土族》), 发表在美国费城出版的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上。文章内容包括: Part I: THEIR ORIGIN, HISTOR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Series—Volume 44, Part 1, 1954(《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 Part II: THEIR RELIGIOUS LIFE, New Series—Volume 47, Part 1, 1957(《土族的宗教生活》); Part III: RECORDS OF THE MONGUOR CLANS: HISTORY OF THE MONGUORS IN HUANGCHUNG AND THE CHRONICLES OF THE LU FAMILY, New Series—Volume 51, Part 3, 1961(《土族族谱》), 本文使用的是其电子版合订本, 2006年由 Charles Kevin Stuart 制作为 PDF 阅读电子版, 其中还补充了一些相关研究资料。康国泰1954年发表的论文《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由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李美玲副教授翻译, 以《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为名, 在《青海民族研究》上自2006年第1期至第4期, 分为四部分连载。

一、作为传教士的康国泰神父

1862年，比利时南怀义神父创办了圣母圣心会，创办的初衷就是要向中国传教。所以，从1865年到1951年，圣母圣心会前后一共派遣了679位传教士前来中国传教。康国泰自1909年至1948年在中国的青海、宁夏以及北京进行传教活动。作为圣母圣心会来华传教的679位中的一位普通传教士，康国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印记也许并不深刻，但他在土族研究中的成就，使其成为人类学史上一个耀眼的名字。

康国泰1883年2月20日出生在比利时布鲁日的一个经营盐和煤的商人大家庭中，家中人口众多，有九个兄弟姊妹。1896年，康国泰在布鲁日一所著名的天主教学校 St. Sauveur, the primary school of the St. Louis Institute 学习，学校开设有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课程，他在语言学习能力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与他同校的，还有一位后来以研究蒙古语言而著名的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田清波神父，比康国泰早入学三年。

1903年9月8日，康国泰和他的同学梅岭芳 (Kervyn Gabriel) 以及葛天民 (Costenoble Cyriel)、穆清河 (VerEecke C. Florent)、狄文华 (De Wilde Benoni) 发愿成为圣母圣心会修会修士。1908年7月12日，康国泰晋铎为神父。与他同一天晋铎的梅岭芳后来被派往圣母圣心会中国东蒙古教区，葛天民和穆清河被派往北甘肃教区，狄文华被派往西南蒙古教区。

为到中国传教做准备，康国泰前往鲁汶大学在闵宣化 (Mullie, Jozef Lodewjik Maria)^① 的指导下学习语言学，由于教材是用俄语编写，他因此又掌握了俄语。康国泰对亚洲的社会风俗和宗教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使其未来的传教事业具有更广阔的人类学视野，他又去到莱顿大学学习世界宗教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课程。

1909年9月21日，康国泰取道俄国，横穿

西伯利亚，前往圣母圣心会中国北甘肃代牧区。^② 圣母圣心会甘肃教区的传教进展缓慢，传教士的工作相对比较清闲。1907年的修会年报中指出：“甘肃的教友仍然很少，与教外人来往也很困难，以致传教士没有太多的工作做。在九百多万将近一千万的教外人，仅有4000位教友和40位传教士。”^[2] 康国泰在甘肃凉州度过了他在中国的最初两年。他用第一年的时间继续加强汉语学习，随后又作了一年的修会司库。

1912年，康国泰与他人类学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次机遇相逢。当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得知在甘藏之间的西宁散居着一百多位基督教信徒，但那里却没有天主教的传教站时，陶福音主教便于1912年将司慰文 (Joseph Essens)^③ 和康国泰派往西宁，去建立一个固定传教站。康国泰先在西宁的塔尔寺里学习了半年藏语，尔后依照修会的指示，在西宁以东四十五里的碾伯 (Nienpei) 建立了一个传教站。在碾伯传教四年后，康国泰又回到西宁，在西宁南大街建筑教堂，负责管理整个西宁教区下面的30多个小传教站的教务。这些小传教站散布在现在的青海互助、大通、湟源、乐都等地。^④ 1916年，继司慰文之后，康国泰成为西宁地区大司祭，他的工作看起来卓有成效，自1920年始，传教士向修会报告甘肃北部代牧区前来听布道的人数骤增，其中尤其以西宁、碾伯传教站最为明显。^[3]

20世纪初，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在中国都有了较大发展。圣母圣心会也在中国的塞外成功立足，传教士们“在这个中国传教工作最难着手的地域”陆续建起了一个个新的传教站点，形成由点到面的传教网络。^[4]

以圣母圣心会中蒙古教区为例，1883年，圣母圣心会成立了东蒙古、中蒙古和西南蒙古3个教区。从1883年开始，中部蒙古教区的信徒差不多每20年就增加一倍。19世纪末20世纪

^① 闵宣化 (Mullie, Jozef Lodewjik Maria, 1886 - 1976)，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士。1886年出生在比利时 Sint Denijs，1909年7月18日晋铎，同年9月被派往中国东蒙古的热河传教。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曾在荷兰的乌得勒支大学 University of Utrecht (Holland) 教授中文。

^② 贝文典，《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简史》，载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台湾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P. 211。20世纪初期的甘肃省的范围大大超越了现在的甘肃省省界，那时甘肃省的南部包括西宁以及安多藏族北部地区。由于甘肃代牧区地域辽阔，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心有余而力所不能及，早在1901年，陶福音主教 (Bishop Hubert Otto) 就曾提议将甘肃代牧区划分为南北两部分。这个提议最后在1905年4月28日得到批准，传信部颁布谕令甘肃监牧区南部正式成为宗座监牧区。

^③ 司慰文 (Joseph Essens, 1877 - 1926)，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士。1877年10月1日出生在荷兰的 Best，1903年9月15日被派遣到甘肃传教，1926年9月11日在陕坝去世，享年48岁。

^④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页900：宣统二年（1910年），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康国泰在西宁南大街设教堂，开始传教。

初，教徒人数增加到约 20000 人，到 1920 年剧增至 44000 人。

教会的扩张使原有教区拆分成新的传教区成为可能。而正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圣母圣心会缺少新的来华传教士，德国圣言会和莱茵省嘉布遣会^①的神父们因为原属德国的殖民地被取消，需要在中国寻找新的传教区。在这样的形势下，1921 年 1 月 15 日，圣母圣心会在中蒙古教区总堂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县城）召开各有关方面的主教、省会会长的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将西南蒙古代牧区分为宁夏和绥远两个教区的暂时协定，同时将甘肃、青海、新疆的教务交给德国圣言会，圣母圣心会在此三地的传教士全部撤到内蒙古和宁夏一带。1922 年 3 月 14 日，教会将中部蒙古西边约有 8000 名教徒的地区，与设有教区总部的西南蒙古东半部，合成新的圣母圣心会绥远教区。而西南蒙古的其他地区成为后来的圣母圣心会宁夏教区。^②

按照宁夏区主教费达德（Godfried Frederix）的传教策略，教会在宁夏的传教以城镇为主，向乡村辐射。传教士居住在城镇里，用“以城带乡”的方式进行传教。1922 年 6 月，康国泰被从西宁调往宁夏银川城（银川旧称），成为圣母圣心会宁夏教区第一位固定的传教士。

1923 年 7 月，宁夏地区共有教友 162 位。至 1926 年，宁夏城已有教徒 226 人，慕道者 49 人，其中包括来自甘肃的 39 名教徒。

1928 年至 1947 年，传教道路变得荆棘满途、坎坷多舛。连绵不断的战争，俄国对中国北方的觊觎，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在北方土地上的角逐，种种皆使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常常感到无助无力。第二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失去比利时母国支持的教会陷入人手短缺、经济断绝的困境。康国泰的教会依靠中国信徒资助，才得以维持学校和机构正常运转。不止一次，为了

躲避强盗和不停爆发的大小战争，他掘地三尺，将他珍贵的笔记、照片以及财物深埋在黑暗却安全的地下。

抗战刚刚胜利，解放战争烽烟又起。1947 年，圣母圣心会在辅仁大学设立怀仁书院（CICM Verbist Academy），初衷是为天主教培养高等人才及修士，康国泰、田清波等被指定为怀仁书院的教师。1948 年 3 月，康国泰穿过国共双方交战的前线战场抵达北京。途中，他乘坐的火车遭到袭击，丢失了三分之一的行李，其中就包括那些珍贵的田野照片。但幸运的是，虽然照片没有了，大部分的田野笔记幸免于难。

辅仁大学的教学生涯短暂却充满温暖回忆。8 个月之后，即 1948 年 11 月，因为中国整个政局的改变，康国泰离开了他生活了近 30 年的中国，转往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市，继续为圣母圣心会工作。十年后，即 1958 年，康国泰从美国返回比利时。他那时已经 75 岁高龄，从圣母圣心会退休。1961 年之前，他因为文章出版的事情还频繁地与美国联系，但此后，他每天除了祷告、读经，就是阅读、笔记，世俗事务已经淡出他的生活。

1971 年 3 月 3 日，康国泰在布鲁塞尔附近的 Grimbergen 去世。

二、作为人类学家的施拉姆先生

土族是甘青特有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五个地区——今天的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三川地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以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

中国的土族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外国探险家、旅行家、博物学家、传教士开启了中国土族研究的先河，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土族的族源、历史、语言、宗教、婚姻、社会组织、家庭制度和

^① 嘉布遣会又译卡普索会。1525 年由马特奥在意大利创立，属天主教会方济各会的分支。嘉布遣为意大利文 Cappuccino 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该会修士身穿深褐色带风帽的会服而得名。该会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

^② 圣母圣心会将宁夏道（今宁夏的石嘴山市、银川市、吴忠市、中卫市）、陕北的三边（靖边县、定边县、安边镇）、内蒙的鄂托克、乌审、杜萨克（土默特）、杭锦各蒙古王子旗（当时蒙古王子的领地）及黄河左岸的汉人垦殖区，组成宁夏教区。地域面积北至阴山，南至长城，东至成吉思汗陵，西至贺兰山脚下。主教府本应设在宁夏城（今银川市），但因宁夏城是新传教区，回民较多，教友人数太少，主教府改设在磴口县的三盛公。那时磴口县归宁夏所管辖。甘肃主教费达德（Godfried Fredrix）调到三盛公，为宁夏代牧区第一任主教，于 1922 年 7 月到达宁夏城。现今的宁夏教区与历史上的宁夏教区有着很大的差别。现宁夏教区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而历史上的宁夏教区包括陕北的三边地区、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巴彦淖尔盟）、鄂尔多斯市（伊克昭盟）中、西部地区 and 宁夏的石嘴山市、银川市、中卫市、吴忠市。20 世纪 80 年代，因行政区划变更，原宁夏教区因属于三个不同省份，就一分为三，河套地区教会因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巴盟教区，陕北三边地区属于陕西省而与延安教区合并，成立榆林教区（现在也称延安教区）。原宁夏教区主教费达德 1938 年去世后，石扬休（Gaspar Schotte）成为宁夏教区第二任主教，石主教 1944 年去世后，王守礼（Van Melclebeke Carlo）主教成为宁夏教区第三任主教，王主教于 1980 年病逝于新加坡。

亲属结构等方面。^①其中,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传教士康国泰,他的土族研究至今仍有宝贵的历史参考价值。很多研究者在对土族研究历史的回顾中,都特别提到康国泰对甘藏地区土族的研究,如卅一之编著的《青海民族史入门》,^②祁进玉的《土族研究一百年——土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述评》,鄂崇荣的《百年来土族研究的反思与前瞻》等。^[5]

在居华传教的过程中,康国泰接触到了汉、藏、撒拉、回等族以及自称为“蒙人”的土人。在这些民族中,土人以其神秘来源、独特的风俗以及鲜为人知的社会生活,深深地吸引了康国泰。他观察到“土人的风俗虽然极受它邻居汉人和近亲西藏人的影响,但还保留着它的原形。它们还可以表示许多古代社会组织 and 游牧生活的秘密”。^{[1](P.2)}康国泰认为,“在研究甘肃这一个民族历史、它的社会环境、它附近的民族、它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生活之后,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文化的复杂性以及我们从这里见到的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1](P.154)}

康国泰在鲁汶大学学习过世界宗教学和人类学,1908至1909年又在莱顿大学研读中国的宗教和一些语言学课程。这些都为他的土族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康国泰在土族人中传教,透过亲身接触,参与观察,记录了大量的人类学的田野笔记。在语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又在塔尔寺学习过地方语言,但具体是藏语、蒙语还是土族语尚不确定。当时在青海懂藏文的只有喇嘛,康国泰也并非第一个在塔尔寺学语言的外国人。据说在1892年,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瑞吉纳特夫妇也曾在塔尔寺向一个叫益西尼玛的喇嘛学习过藏语(他们觉得也许学的是藏蒙混合方

言,或者是土族语)。^[6]康国泰的调查对象多少会说一些汉语,这样就给康国泰调查记录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土族的土司也成为康国泰的信徒。康国泰利用为他们看病的机会,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得以了解他们个人或家庭中的一些隐私事件。此外,作为从欧洲来的传教士,康国泰也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教区内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汉族)要求康国泰教授为他的儿子代数和几何,康国泰很好地利用了这个能接近并熟悉当地官员的机会,和汉族官员以及学者都发展了良好关系。这个事件带来的直接效果是,当地乡村的官员、藏族和土族的土司,以及庙里的喇嘛们,常常请康国泰做中间人,代表他们向汉族官员解释问题。这种交往使康国泰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也因此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土族各阶层不同的生活。

因为康国泰是一位传教士,他的日常生活的重心还是以传教为主,对土族的人类学研究只能在传教之余进行。但是,康国泰坚持每天记录观察笔记,并从中文地方志资料中搜寻相关的材料。他主要使用的中文文献有《西宁府新志》、《甘肃新通志》、《皇清职贡图》等。1932年,为了“力求在同样忠实而又尽可能全面的情况下提供一切人类学和历史方面的资料”,^{[1](P.154)}他首先将他对土族婚姻的研究整理成书,名为《甘肃土人的婚姻》(Le Mariage chez les T'ou-jeu du Kansu),在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

1948年11月,因为中国政局的变化,康国泰离开北京去往阿灵顿。在他的自述中,他选择阿灵顿,是为了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的相关中国资料,完成他对土族的研究。1949—1950年

① 近代以来,外国人对土族的研究有“俄国学者波塔宁(G. N. Potanin)在1885年曾到今民和官亭镇,收集土语三川方言,后在其所著《中国之唐古特土伯特边地及蒙古中部》(1892年)第二册录有三川土语。1891—1892年,美国人柔克义(W. W. Rockhise)也曾到土族地区旅行,并收集土语方言资料。俄国学者史禄国在其《通古斯族的社会组织》(1924)一书中指出,土族与满族有许多相似之处,提出土族与东胡人的渊源。比利时神甫德斯迈(A. de. Smedt)、孟塔尔(A. MosTaer)经语言考证,认为土人就是蒙古族。1906年,Filchner和RaFel发表的对塔尔寺的研究中提及,‘土族是吐谷浑、西夏(shat' o His Hsia)的后代’。比利时神甫许让(Le P. L. Schram)曾著有《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瑞典人Dominik Schrode教父于1946年—1949年居住土族地区,对土族宗教进行深入研究,他的研究更加注重个体而不是群体,进一步补充了许让的研究。1960年,匈牙利学者A. Rova - Tas的《TiheLo - Mongolia》一文,探讨了藏语及藏文化对土族的影响。日本学者角道正佳利用德、法、英、俄、汉等语言资料,研究土族语及其他,可谓硕果累累,如《土族语的下位方言(次方言)》(1987)、《关于土族语中的接尾词——ngge》(1989)、《土族语方言的自由交替》(1990)、《土族语的正字法》(1991)、《青海、甘肃蒙古系民族中流传的蟒古斯故事》(1990)和《土族人的婚礼仪式》等文。”转引自祁进玉,《土族研究一百年——土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述评》,《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p.44。

② 卅一之编著,《青海民族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08月第1版,p.181。“到了三十年代后,在土族研究方面出现了四部重要著作,即天主教神父比人许让(Le. P. L. Schram)所著《甘肃土人的婚姻》(1932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出版),和天主教普爱堂神父比人德斯迈(A. de. Smedt)和孟塔尔(A. MosTaer)收集互助沙棠川那林沟语言材料所著的以《甘肃西部蒙古土蒙哥方言》为题的三部书《语音》(载《人类》杂志1929年第24期,1930年第25期和1931年第26期);《语法》(1945年北平印单行本)及《辞典》(1933年北平辅仁大学单行本)。他二人把土族称作‘蒙哥尔’。外国学者研究:从语言考察者把土族列入蒙古族系;从历史考察者指出她与东胡的渊源关系。”

间,美国蒙古学专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邀请康国泰参与他主持的一个关于蒙古区域研究的项目。在资金方面,康国泰同时也得到了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第二年,康国泰又得到费城的美国哲学协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资助,得以继续他的土族研究。

康国泰的土族研究还得到了同属一个修会的田清波(A. Mostaert)和司律义(Henri Serruys)^①的帮助。他们在蒙古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诣,使康国泰受益匪浅。

康国泰对青海湟中地区的土族研究《甘藏边境的土族》陆续发表在《美国哲学协会会刊》(自然科学类)上:第一篇《甘藏边境的土族:他们的起源、历史和社会组织》,载1954年《美国哲学协会会刊》,卷44第1号;第二篇《甘藏边境的土族:他们的宗教生活》,载1957年《会刊》,卷47第1号;第三篇《甘藏边境的土族:土族系谱记录,湟中土族史与鲁家家史》,载1961年《会刊》,卷51第3号。第一篇介绍了蒙古尔部族的组成、形成和发展,并对其族长、土司的特点和承继作了详尽的描述。第二篇是对土族的宗教生活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土族生活有巨大影响的藏传佛教、萨满教以及康国泰所观察到的其他一些信仰事象。第三篇分析一个鲁姓的土族部落家族的历史。

康国泰受过人类学的学科训练,他的著作具有人类学视角的关照。他学习了研究对象的语言,在研究现场收集资料,长时间参与式观察,进行大量的访问,然后在此基础上整理,对研究对象做整体性的描述,最终完成了土族的微观民族志。在《甘肃土人的婚姻》和《甘藏边境的土族》中,康国泰运用了古典人类学的理论以及民族志作品写作的叙事范式,来描述土族的家庭、婚姻、族源、宗教和历史。由王同惠和费孝通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被列入中国人类学的经典必读书目。

康国泰认为甘肃土族一部分来自突厥系统的民族,一部分来自属于蒙古系统的民族,是蒙古

人和蒙古化沙陀人的融合体,这个论证和现在土族研究学界的观点一致。同时他对土族社会细致的观察和对日常生活的详细记录,为我们现在的土族研究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

作为在西方人类学兴起后,接受过人类学知识培养的天主教传教士,康国泰的人类学成就并非独一无二的。仅在圣母圣心会中,田清波、司礼仪、闵宣化、贺登篙、彭嵩寿、梅岭蕊、闵玉清等,都在文化人类学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又如德荷圣言会在中国西北传教的传教士中,亦有三位有着人类学家和传教士双重身份,他们是:Matthias Hermanns, Dominik Schroder以及Johann Frick。^[7]而在圣言会接管的辅仁大学中,既是传教士又是人类学家的更比比皆是。

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传教士人类学家,改变了早期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整理与收集者之间的分离特点,他们自己收集资料,自己整理分析,就在当地写作,缺乏的资料当场可以补充。他们的研究旨趣与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家不同,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类学家“带有国家建设的实用目标的人类学研究”,^[8]也不是后来日本侵华后为搜集情报而进行的深度的民族志调查。传教士都在中国生活多年并且熟悉中国的各个省份,尤其是对中国的边远地区如青海、甘肃、西藏和新疆等,他们的了解远胜于那些为调查而调查的学者们。他们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民族志研究、人类学研究和民俗研究文章,不仅揭示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和思想,也有助于理解许多中国民俗的细节,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康国泰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6岁之前,康国泰将自己奉献给他视为神圣的福音事业,一切努力和准备都是为了将天主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的近30年时间(1909年至1948年),主要工作是宣扬天主的话语,将对人类学

^① 司律义(Henri Serruys),美国蒙古学家。1930—1940年,他在中国传教,对蒙古和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194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东方学研究,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后永久性移居美国。他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著名前辈学者,他有关明初内地的蒙古人,明朝前期与蒙古的关系,以及《华夷译语》等文献的著述,对蒙古学研究很有价值。如《关于肖大亨的〈蒙古风俗记〉的研究及其法译本》、《天皇后代世袭谱》等,还有明朝与蒙古关系方面的大作,第一卷名为《1368—1398年间的中国的蒙古人》(1959),第二卷名为《贡纳与外交使团(1400—1600年)》(1967),第三卷名为《商业关系:马市(1400—1600)》(1975)。他还做了对著名蒙古学家的论著进行写摘要、介绍和报道等工作。以上介绍转引自德力格尔,《美国蒙古学研究概况》,《蒙古学年鉴》(2005)》。

的兴趣隐含在他的传教中；1948年去往美国后，他致力于青海土族的研究；康国泰生命最后的10年，世俗的宠辱渐行渐远，他安静地读经祷告，直至生命最后时刻。

一个发愿将自己一生献给传扬天主福音的神父，最终是怎样成为一名以研究土族社会而闻名的人类学家的呢？如果我们把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再思考他所拥有的传教士和人类学家双重身份，就可以寻找到答案。

首先，当时的时代背景使得中国成为康国泰传教的必由之路。身处变革的20世纪，康国泰亲身经历了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剧烈变化。欧洲失去了非洲殖民地，他们的视线开始转向东方。1858年和1860年的一系列条约，致使中国的广袤内陆被迫向西方开放。圣母圣心会在比利时国王的支持下成立，创始人对中国的偏好，反映了当时的传教者及其赞助人的倾向。比利时想在中国扩张势力范围，对比利时来说，在中国真正的代表是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而不是那些驻华的使节。^①在这样的背景下，康国泰从比利时来到了中国。

其次，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在西方的兴起。随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航海贸易的驱动，海外殖民的需要，以及异文化的冲击，人类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出现。荷兰的莱顿大学在1877年就设有第一个民族学的职位。其人类学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印度学，包括为殖民官员服务的民族学；二是社会志，即地理志、民族志和应用社会学的结合。19世纪上半叶，比利时就已经出现了民俗研究和方言学研究，并且于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几个关于地方史、考古学、大众传统和方言学的学术团体和杂志。进入20世纪后，比利时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与其在非洲的扩张有关。创办于1927年的鲁汶天主教大学人类学系是比利时最大的人类学系，用英语和荷兰语授课。人类学在大学里不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各国相继成立了专业的研究团体，定期出版人类学民族学杂志和刊物。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如泰勒、卢伯克、麦克伦南、魏茨、利伯特等著述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文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中心。

作为要往异国他乡传教的传教士，需要系统了解如何在异民族和异文化中生活。圣母圣心会鼓励传教士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20世纪初，被派往各国传教的传教士们竞相学习有关人类学和人种学的知识，修会也鼓励他们学习人类学并支持他们订阅人类学出版物。奥地利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威廉·施米特神父(P. W. Schmidt)是对康国泰影响较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康国泰的文章多处引用了施米特的研究成果。施米特早年受到格雷布纳“文化圈”理论模式的影响，又吸收了瑞典生物学家科尔曼的俾格米理论及安德雷·兰的历来信仰天赋观念，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被称为“人类学维也纳学派”。他于1906年在维也纳创办了《人类学》杂志(ANTHROPOS)，是一本具有国际视野的综合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的期刊。圣母圣心会的长老也鼓励自己修会的传教士订阅。刊登在杂志上的人类学文章不仅拓展了传教士的人类学视野，也激发了他们人类学研究的兴趣。

在中国，施米特的“文化圈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究其原因是因为留学德奥学习民族学的中国学生极少，仅有陶云逵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汉堡大学学习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陶云逵在其《西南部族之鸡骨卜》一文中运用文化圈的观点研究云南新平鲁魁山彝族的鸡骨卜，并联系傣苗的鸡骨卜记载，将这一文化现象扩展到西南地区，在历史记载中寻找材料，探讨起源与传播、传播过程与变迁及其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的关系，来分析其分布区域。对施米特的传播论学派在中国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的主要是辅仁大学的传教士们。辅仁大学的校务长雷冕就是施米特的学生，他在历史研究所主讲民族学的课程，采用的教材就是施米特的《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

再其次，进行文化研究的传教士群体。20世纪初期，传教事业在中国进展比较艰难。1908年，圣母圣心会甘肃省会长在报告中写道“教友很少，与教外人来往也非常困难。所以传教士没有太多的工作可做。这种情况导致在传教区待了十年后必然会面临沮丧忧郁的困境。学习语言

^① Paul Rule, Chinese-centered Mission History, (Leuven Chinese Studies I),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Belgium, 1994, p53. 转引自硕士论文未刊稿《利奥波德二世(1865-1909)与中比关系之研究》，第43页。

或许可以帮助传教士克服这个危机。中国语文所蕴涵的渊博知识，是进入政商界或文人圈的必经管道。省会长希望借学习中文使传教士成为受人推崇的汉学家。这当然得依靠修会的保障，也是传教士发展自己能力的一个机会。”^{[2] (P.212)} 这些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相当成就的传教士，在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相当广泛的资料。在圣母圣心会在华的传教士中，语言学方面最有成就的就是田清波，他是蒙古语言学、蒙古史及民俗学考古学的权威，出版了《蒙语集》和《蒙汉大词典》；闵宣化致力于热河汉语方言的语言和语法的研究，用二十年时间编辑成《热河方言文法》；贺登篙与司礼仪对山西方言进行了研究，司礼仪从描写语言学的角度深入研究山西大同南部的谜语、儿歌和民间故事，用国际音标注中文，并分析语法规则和韵文音节，还附英译文。贺登篙则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研究晋北方言的历史演变，特别是它与行政地理的沿革，经济文化变化的关系。贺登寿编撰了中国第一部方言地理学，上编论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下编具体考察晋东北地区的方言分界。^[9] 彭嵩寿 (Van Oost Jozef) 蒐集民谣及土默特谚语；梅岭蕊 (Kervyn Louis) 撰写了《辽道宗庆陵内最初发见的契丹文》，这是国内外关于契丹文研究的开端。狄化淳、方希圣 (Van Genechten Edmond) 则是画家，对于圣艺中国化贡献良多。闵玉清编辑了蒙文 - 法文/法文 - 蒙文的口语字典。^{[2] (P.201)}

在人类学方面，有司礼仪对大同南部的婚俗、谜语、儿歌以及民间故事进行的调查，再将该地民间风俗与亚洲其他地区加以比较研究。贺登篙神父在大同的东南地区调查了140个村庄，约400个大小庙宇，发掘了不少当地居民宗教礼仪的历史渊源，1946年辅仁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发表了其以中、英、法三种文字对照写成的山西大同东南乡庙宇调查。瞿德华于抗战前夕接连发表论文系统介绍鄂尔多斯蒙古族的风俗，如《鄂尔多斯蒙人的婚俗》、《鄂尔多斯蒙人的婴儿及幼年时代的风俗》、《鄂尔多斯蒙人的疾病死亡和埋葬的风俗》。

传教士是中国早期人类学发展历程中的奠基者之一。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中，外国人类学调查者对中国的民俗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是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外国人类学调查者主要来自欧美、俄国和日本，职业各不相同，有的是商人、旅行家、外交家、教师或者是传教士，有的确实就是人类学学家，如俄国的史禄国、日本的鸟居龙藏等。研究成果多以本国文字写作，或者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或者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中外刊物杂志上。对中国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各个方面感兴趣的传教士，虽然国籍不同，但是研究旨趣大都相似。他们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类学》(ANTHROPOS)、《华裔学志》、《亚洲民俗学》([Asian] FOLKLORE STUDIES)^①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和文章。这里以1935年在辅仁大学创办的《华裔学志》为例，看传教士对中国人类学知识的传播所起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华裔学志》的主编是德国圣言会的鲍润生 (Franz Xaver Biallas)，曾言《华裔学志》要为一般大众完成的目标为：“远东现今面对现代社会和文化迁变的紧迫压力，如此在要求身处现代风暴和压力期的传教人员对此地民族、语言、文化有更深刻的认知……当今的处境已使得传教人员不易与时代的诸多发展齐肩并进。更不易得知他当于何处作为、如何作为。我们在此类事务上襄助传教人员，促进我们的传教任务”。^[10] 《华裔学志》是当时在中国的“神职人员科学研究的集中发声所在”，固定投稿者很多都来自在华传教的各差会，他们议论发表的主题甚为多样，包括蒙古、西藏和满洲研究，涉及语言学、人类学、佛学、文学、哲学，也旁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田清波不但在《华裔学志》上发表了多篇关于鄂尔多斯方言研究的文章，而且还是《华裔学志》负责欧洲方面的副主编。此外司律义和司礼仪也曾任过《华裔学志》的编辑。

费孝通在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所作的序言《青春作伴早还乡》中感慨，得到这本译稿本身的经历是连他自己也不敢信以为真的传奇。康国泰的《甘肃土人的婚姻》用法语写

^① 1942年，圣言会士 Matthias Eder 在北京用德英两种语言创办了《民俗学志》(Folklore Studies)，初期每年一刊，后来一年若干本。内容以调查中国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为主，民间文艺为副。至1947年出版六期后搬到日本，在名古屋继续出版，现已成为由圣言会在日本名古屋南山天主教大学的正式出版物。

成，1935年在吴文藻的建议下，王同惠将其翻译成汉语，由费孝通阅校，译稿在二人的蜜月里整理完成。1978年，在经历了王同惠遇难、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这些重大事件之后，手译稿奇迹般地重现。这部译稿的重现，“预示了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的来临”。^{[1] [P.10]}

1992年，潘乃谷和高丙中二人对康国泰曾经做过调查的土族地区继续做了后续调查，用以与世纪初调查者所见的甘肃土族的婚姻制度和相关的社会情况作为对比，从而看到土族婚姻的变动。1998年12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译稿、费孝通一万多字的序言、潘乃谷、高丙中的追踪性的实地调查报告合集出版。

(参 考 文 献)

- (1) 许让神父(费孝通,王同惠合译). 甘肃土人的婚姻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2) Daniël Verhelst. 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 [A]. 古伟瀛. 塞外传教史 [C]. 台湾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 2002. 107.
- (3) 汤开建, 马占军. 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甘肃传教述论 (1878 - 1922) [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3): 95.
- (4) 德礼贤.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M].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 88.
- (5) 鄂崇荣. 百年来土族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J]. 青海社会科学, 2007, (1): 85.
- (6) 房建昌. 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瑞吉纳特夫妇在青海藏族地区的传教活动及其它 [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8, (2).
- (7) Dr. Bianca Horlemann, *Th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in Gansu, Qinghai and Xinjiang, 1922 - 1953: A Bibliographic Note* [J]. *JRAS, Series 3, 19, 1* (2009), p. 59.
- (8) 王铭铭. 非我与我——王铭铭学术自选集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333.
- (9) 王庆余. 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J]. 东南文化, 1987, (2).
- (10) [德] 巴佩兰 (Barbara Hoster) (谢惠英 Hsieh Hui-ying 译). 《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对西方汉学的贡献 [J]. 汉学研究通讯, 2004, (90): 3.

A Study on Louis J. M. Schram , a Missionary and Anthropologist of CICM in Belgium

WU Ning

(Guangdong Institute of Ethnic Religion , Guangzhou , Guangdong 510180)

[Abstract] Louis J. M. Schram , a foreign missionary and anthropologist in China , made anthropological observations of the Tu ethnic group in Southern Gansu while he was preaching religion in Gansu and Qinghai. Later he became an anthropologist famous for his studies on the society of the Tu people.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his life experience as an anthropologist including his social background , studying content ,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 intending to explore the history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anthropology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Key words] missionary; anthropologist; Louis J. M. Schram

(责任编辑 李 劼)